

分析《霸王别姬》的文化本质

/ 王红燕

【摘要】电影《霸王别姬》是一部极具文化意义的作品，影片通过对一代京剧艺人的经历进行追踪刻画，探讨了在历史变更作用下京剧艺术的现状和未来，并深刻的展现了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创作者将他对传统文化、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的思考融入影片中，使得观众在体会京剧艺术无限魅力的同时，更加深刻的感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化内涵和本质意义。

【关键词】生存现实；文化风景；历史文化展现

【作者简介】王红燕，1983年6月出生，汉族，河南鹤壁人，安阳师范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艺术学专业。

一、生存现实与文化风景交织相融

电影《霸王别姬》是一部极具文化意义的作品，其根据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改编，由导演陈凯歌执导。影片通过对一代京剧艺人的经历进行追踪刻画，探讨了在历史变更作用下京剧艺术的现状和未来，并深刻的展现了中国当时的历史文化。陈凯歌对民族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和浓郁的情结，这直接表现在《霸王别姬》中，使其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电影。影片中刻画的人物生活的场景，既是当时人们的生存现实，也是中国老北京传统文化的映射。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都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缩影的真实写照。

影片在表现生存现实时，亦不遗余力的展现了文化风景，即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霸王别姬》展现的是一段漫长的中国现代历史：从民国时期开始，其间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后来动乱的十年，最后到文革后这一段时间的政治历史文化现状。政治的风云变化，使得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剧中，段小楼和程蝶衣对日伪军的反抗，在文革期间为维护国粹京剧坚决反对现代戏对京剧的粗制滥造和政治化……这一系列的事实表明，时代在变化，文化艺术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在恶劣的环境中甚至造成了文化艺术的暂时性衰退。社会的混乱也直接导致了对京剧艺人的不尊重对待，一代艺术家在政治大环境下不可避免的惨遭打击，沦入社会最底层，饱受折磨和迫害。

影片中还表现了老北京百姓生活的很多场景，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韵味，可以说是对老北京文化景观的全方位的描绘。花满楼妓院、古老的城墙、喜福成科班所在的四合院，还有象征儒家文化的孔庙等，这些都展现了北京古老的建筑文化和居住文化；街头的小食摊，北京的特色小吃，还有袁四爷家的霸王别姬宴等，这些都展现了老北京的饮食文化。当然除了这些，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是京剧文化。京剧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影片围绕京剧文化展开，正和观众的心意，影片更能得到观众的认可。霸王和虞姬台上的生离死别，其实也正是饰演霸王的段小楼和饰演虞姬的程蝶衣台下现实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主人公在恶劣的生存状态下不管是软弱妥协，还是拼命抗争，无论是慷慨赴死，还是苟且偷生，他们的情感和命运的巨变，无不淹没在历史的洪流巨变中，最终化作历史的记忆封存在岁月中。

在影片中，我们在感受人物曲折人生的同时，还看到了京剧的历史兴衰。从关师傅的口中，我们大致了解了京剧文化的源远流长。关师傅作为一个职业京剧人对待职业的自豪感，让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了中国老一辈京剧艺术家对京剧艺术无私的传承和深沉的爱。影片在讲述“霸王”段小楼、“虞姬”程蝶衣漫长的人生经历时，其实也是在讲述京剧的发展历史。京剧艺人在旧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新中国成立后才成为受人尊敬的艺术家，但文革的到来，使京剧艺人再一次被贬入社会最底层，毫无地位可言，甚至境遇更加的悲惨，京剧传统戏也遭受了灭

顶之灾，很多经典的剧目被当成垃圾而烧毁。影片中，段小楼的妻子菊仙自杀时，收音机里却正播放着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这种不同境遇的对比，正是对京剧传统戏遭遇毁灭性打击的真实写照。而在影片的片尾，又出现了一条字幕：“1990年，北京举办了徽班进京200周年纪念活动”，这不仅是对在“文革”中受到灭顶之灾的传统京剧的拨乱反正，更是对京剧发展史的一次深刻总结。这样的结尾给观众无限深思：中国京剧在风雨飘摇中百折不挠，坚强成长，最终得到公正待遇。至此，观众在审美心理层面与影片所要表达的情感实现完美统一，产生强烈共鸣，进而达到高潮。

二、从生存现实中展现民族历史文化

影片选择把中国文化积淀最深的京剧艺术和京剧艺人的生活作为表达对象，深刻的反映出了导演陈凯歌对民族传统文化、人的生存状态、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对人性的思考和领悟。影片中对文化的表现是实实在在、有根有据的，没有一点虚构和假设，老北京的街市环境，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等，都是一种文化。可见，人物的生存环境其实就是一种文化风景，这就使得影片有了其存在的意义，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真实的反映生活。但是，《霸王别姬》又与一般的历史再现性电影有着本质的区别：影片在再现历史的同时，深刻的反映了创作者的文化表现和情感依存。电影中的一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构建了独特的历史风景和文化表现，更承载着创作者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深思。

可以表现人生的主题有很多，归结一句话，不外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统一。在《霸王别姬》中，饰演霸王的段小楼和饰演虞姬的程蝶衣这两个京剧艺人，被创作者作为文化思考的载体，他们的生活和情感、痛苦与挣扎贯穿影片的始终，这使得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屏幕上表现为戏剧理想与生活际遇矛盾冲突，导致主人公产生困惑和迷茫，甚至绝望。“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戏剧作为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形式，能够全面的再现生活，但艺术之所以为艺术，是因为它并不完全等同于生活，而是在现实的基础上，融入了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和审美理想。艺术家在创作时，对现实中的不完美人生加以修改和弥补，融入自己的情感寄托和审美理想，在艺术表达过程中给人以美的享受，从而使观众获得心灵上的慰藉和情感上的共鸣。《霸王别姬》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答案正在与此。

影片在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描绘中，其实真正传达给我们的的是中国文化的某种深刻的本质。这种文化本质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中有其积极向上的一面，也有其消极、滞后的一面。中国的民族文化精华因为有这么本质的存在而得以传承和延续，但受几千年封建思想影响的文化本质不可避免的也有其扭曲、不符合历史潮流的一面。影片中关师傅在对弟子说戏时，对英雄故事以及故事中的英雄气概盲目的夸大和崇拜，特别是在说到霸王的故事时充满了感染力和煽动性，可以说是把英雄主义思想渲染到了极致。关师傅的这种英雄主义的文化理想本身无

可厚非，但把其作为教育的目标，离现实社会太遥远，不符合实际生活和当时的历史现实。关师傅的徒弟们在受到师傅英雄主义思想教育的同时，又被关师傅以各种形式的体罚进行教育，甚至是一些极其伤害个体自尊的形式如罚跪等，这两种教育的同时进行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矛盾，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从小就被伤害自尊、被扼杀自信的徒弟们，如何能在这种矛盾的教育体制下成为英雄，如何能顶天立地，创建一份霸业！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更是不可能实现的。影片中霸王的人格理想与凡夫生活现实的矛盾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正是中国文化理想与人性产生矛盾的具体体现。当然，除了这种矛盾性以外，从关师傅的身上我们也深刻的感受到了京剧艺人作为文化继承者忠于艺术的那种精神，尽管这种精神可能在思想层面上与中国的现代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却是弥足珍贵的，它的光芒不会

因为历史的尘埃而被掩盖，这种精神是永远值得中华儿女传承和延续的。

《霸王别姬》作为中国影视文化中的经典之作，是一部展现命运的悲剧，也是一部展现历史的悲剧，更是一部展现“文化悲剧”的悲剧。创作者将他对传统文化、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的思考融入影片中，并通过把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京剧艺人的生活作为表现对象搬上荧屏，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要，使得观众从这些人身上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了京剧作为国粹艺术的无限魅力，感受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化内涵和本质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俊, 张长营. 论电影《霸王别姬》对传统观念的解构 [J].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9).

(上接 228 页)

成分，但是部分甚至语义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圣经名言“оливковая ветвь”和圣经关于大洪水的传说有关。上帝让洪水滔天，但仍然惦记着挪亚，遂使风吹过大地，水慢慢消退，山顶露出来了。又过了 40 天，挪亚打开方舟放出一只乌鸦，乌鸦没有回来。挪亚又放出一只鸽子，想看看水是否已退，但由于地面还有水，鸽子无法落脚，便飞回了方舟。又过了 7 天，再次把鸽子放出去，这次鸽子回来时，嘴里衔着一支翠绿的橄榄枝，这标志着水已完全退去，安全了。后人用橄榄枝象征和平。

1. Сакашвили ясно дал понять, что, предлагая Путину оливковую ветвь, он не намерен менять позицию Грузии..

萨卡希维利明确的表示，虽然向普京伸出了橄榄枝，但是他并没有改变格鲁吉亚立场的意图。

圣经名言“Козел отпущения [искупления]”出自《旧约·利未记》，在犹太教赎罪日这天，大祭司举行赎罪祭奠。先杀两只公羊，然后将双手按在另一只羊头上，诉说自己与众人所犯之罪，并表示这一切罪过都应该由这只羊承担，言毕便将其弃之于旷野，说明众人之罪已由羊负去。这句名言由此便指代人受罚者，即“替罪羊”。

1. Подозреваемые лидеры преступного мира: «Мы оказались козлами отпущения в скандале МВД».

犯罪集团的嫌疑犯头头们说：“我们成了内务部丑闻的替罪羔羊！”

本文简单地介绍了圣经名言、其分类和使用。通过分析我们看出，出自圣经的名言因其鲜明的表现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至今仍被人们使用，并不断丰富含义。我们不仅可以在文学作品、报刊杂志中遇到圣经名言，甚至在口语中也会经常听到，它们以其特有的魅力丰富了我们的语言 and 思想。

参考文献：

[1] Бирих А.К.,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фразеологии. Ростов на Дону: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Феникс», 1997.

[2] Матвеева Н.П. Библизмы в русск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Русск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 1993.

[3]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 Гл. ред. Ф.П.Филин. М.: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79.

[4] 刘光准.《圣经》俄语成语.中国俄语教学(季刊),1997.